

战斗在敌后的《浙西导报》

一九三八年九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猖狂进攻的时候，就在日寇据点林立的浙西平原地区，出现了一张宣传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铅印小报——《浙西导报》（初名《啸报》）。它象暗夜里的火炬，给沦陷区的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温暖与鼓舞，照亮了抗战必胜的前进道路。

从《啸报》到《浙西导报》

一九三七年冬天，海宁县硖石镇吴曼华（吴梅）等七名爱国青年，流亡到了浙东。后来转到金华，被《东南日报》印刷所中共地下党组织知道，就动员他们回家乡参加抗日。当时吴曼华、陈才庸、张纪斐三人赞成这一主张，但对家乡沦陷后的情况已经不了解了。就决定由吴曼华先回去看看。

一九三八年四月，吴曼华回到硖石。她在抗战前曾编过《硖石商报》的副刊《女声》，这时，一位熟悉的青年告诉她：“老板已经逃走了，留下一台印刷机和半副铅字，可以搬到乡下去出报”。这年夏天，他们决定到硖石东面乡下去办报，并由当地青年陆欣夫、李国庆（原海宁印刷所排字工人）将印刷机、铅字搬到一条船上，伪装成稻草船，吴曼华扮成“病人”，并准备了两篮鸡蛋，半夜里途经日寇设立的关卡，在检查时送了鸡蛋才顺利通过。不料中途又被国民党六十二师的谍报员截住，抢去机器铅字，并强迫陆、李二人到袁花为他们排印报纸。

正当此时，日寇疯狂下乡扫荡，国民党军政人员闻风逃窜。吴曼华找到陆欣夫、李国庆，约好了当地几名青年，在一六夜里，又把机器和铅字悄悄运到乡下，隐藏在一家农民家里。并设法把机器转

运到海宁县路仲镇郊到桐乡县屠甸附近。这个地方日寇尚未设立据点，附近只有少数几股游杂部队。经过筹备，一份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宣传抗日的报纸——《啸报》，就在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十八日在这里诞生了。

当时，日寇经常下乡烧杀抢掠，参加办报的一共只有吴曼华、陆欣夫、李国庆、姚逸凡（肖牧）、钱慧珠等六个青年和从硖石请来的两名印刷工人，既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和一切必要的设备，也没有办报的经验。几乎是白手起家。除了请来的排字工人要付给他们起码的工资和香烟钱（还要经常做些思想工作）之外，报社的全部人员都是尽义务的，只由集体供给粗菜淡饭。他们租借了农民的住房，每天夜晚，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报纸是八开日刊，一共两个版面，一版是国内和国外消息，二版是地方新闻和副刊，重点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各党各派的力量共同对敌。时事消息的来源，主要是利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收录上海租界上《大美晚报》等外国电台的广播；后来也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地方消息，则通过同当地抗日武装的联系，由他们供给，部分的也有敌区来的情报和递步哨带来的消息。每个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既要能编会写，熟悉各个战场的状况，还要懂得如何排字印刷。编报的人每天工作到半夜，往往睡了两个小时又要起来校对，人手少时一天也睡不了几个钟头；排字印刷基本上都是在下半夜。报纸一出版，通过递步哨，很快散发到海宁、桐乡、平湖、崇德、德清等地。最初日销三百份，最多时达到八百多份。

报社的经费来源，一是靠发行报纸收费，二是争取附近两小股游击队的同情、接济；三是替邻近乡、镇公所商店印些收据、账册，藉以维持日常的起码开支。由于报纸天天发行，影响很大，也震憾了日伪海宁县县长谭裕卿。当有一次报社警告他不要再死心塌地的为

日寇卖命充当汉奸，同时要他，抗日报纸捐款时，他也不得不寄了几百块钱来。

一九三八年冬天，国民党绍兴专员公署的政工队来到海宁、桐乡、崇德一带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接管了报纸。经吴曼华出面和政工队长胡云翼谈判，他答应了两个条件：一是宣传抗日的宗旨不变；二是报社原有的工作人员不变，同意改名为《浙西导报》，由胡云翼兼任社长、吴曼华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内部分工是姚逸凡、陆欣夫为编辑，钱慧珠负责财务和发行。

一九三九年夏天，由于日寇不断下乡骚扰，报社迁移至洲泉镇附近。当时，洲泉镇金文楚主办的同样性质的《后盾报》并入副刊，继续发行。

一九三九年冬天，绍兴专员贺扬灵调升国民党浙江省府浙西行署主任，《浙西导报》也随着划归浙西行署管辖。

《浙西导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实践，报社人员深切地体会到，仅凭一股抗日的爱国热情，在政治上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而在组织上、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党的领导是办不好报纸的。一九三九年夏天，吴曼华到浙南龙泉寻找党的组织。她找到陈才庸、张纪斐，讲了自己的来意，希望《浙西导报》有共产党的领导，并欢迎他们两人和其他党员同志来报社工作。张纪斐把吴曼华的请求向当地党组织作了汇报，龙泉党组织认为：可以考虑派我党人员到《浙西导报》开辟党的工作，加强报社的力量。张纪斐还介绍吴曼华到金华与邵荃麟、葛琴取得联系。他们听了吴曼华在浙西敌后办报的情况介绍，很受感动。事后葛琴写了一篇《活跃在浙西敌后的文化女战士》的文章，还附了一张吴曼华在煤油灯下编报的照片，刊登在《浙江妇女》杂

志上。吴曼华在金华、龙泉等地的一个多星期中，学习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其他一些文章，还带了许多书报、资料回来。

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四至五月间，中共浙西特委陆续选派了张纪斐、骆静婉、陈才庸等党员，以国民党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到《浙西导报》开展工作，成立了党小组。这时，省政工二队队部驻在洲泉，队长姚旦是中共省政工二队特支书记，当姚旦和他们接上组织关系之后，又发展吴曼华入党。一九四〇年四、五月间，中共《浙西导报》特别支部在洲泉蒋家浜成立，由陈才庸担任书记，属嘉、崇、桐工委领导。特支成立后又发展了印刷工人刘方公、倪加民入党，党的力量得到了充实和加强，使《浙西导报》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战斗方向的抗日进步报纸。

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浙西行署对《浙西导报》的抗日宣传活动很不放心，不断将他们的亲信派来，妄图改变报纸的性质。首先，派来罗越崖任副总编辑，不久就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一次，他趁吴曼华外出之机，擅自刊登了一篇张君写的反共文章，吴曼华发现后向他指出：这样做不利于国共合作，不利于抗日。通过说理斗争，进一步提高了报社人员的政治觉悟。后来，当罗越崖还要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辩护时，报社人员都和他辩驳，迫使罗越崖作罢。吴曼华又找到胡云翼，把罗调走。接着派来王新民当编辑，不久在日寇扫荡时被打死。后又派来张星希，这人站在国民党顽固派一边，导报特支依靠群众，找到借口，也把它轰离了报社。第四次派来的胡企曾，曾想在报社工作人员中发展三青团员，当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时，又挑拨唆使一名编辑离开报社。导报特支跟他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样迫使他

在报社站不住脚。第五次派来的梁获云，虽也曾想探听报社党组织的情况，但导报特支早已布置党员提高警惕，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实际上使他处境十分孤立。

当时，浙西行署在天目山，离开洲泉二百多华里，交通不便，鞭长莫及，对导报的内容只能事后审查。一九三九年冬天，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派人把吴曼华叫到天目山，亲自进行盘问。他开门见山就说：“你在今年夏天到龙泉，有人讲你是去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是不是？”

吴曼华反问他：“我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参加共产党的会议？”

贺扬灵追问：“那么，你去做啥？”

吴曼华不慌不忙地说：“我在那边有张纪斐和陈才庸两个同乡人，我们一起从家乡流亡出来，同生死，共患难，多年不见，去看望他们。”

贺扬灵忽然把话题一转：“我介绍你参加国民党好不好？”

吴曼华回答他：“我是国破家亡了，只有一生报国，别无他求。”

贺扬灵被弄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一九四〇年夏天，国民党驻浙西的二十八军军长陶光，在他召开的“敌后宣传会议”上，提出要《浙西导报》随军行动，想用武装来控制报纸。吴曼华当即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印刷机、铅字笨重，如何随军行动？二是打乱了固定的发行网怎么办？三是报社归行署领导还是军队领导？陶光无法回答，只好作罢。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浙西导报》刊登了延安召开反汪大会和毛主席讲话的消息，引起了到会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为了控制这张报纸，贺扬灵派张国焘来当社长，坐镇报社。但张国焘是个贪

婪

生怕死之徒。他刚刚走马上任，碰到日寇扫荡就只身躲到日寇盘踞的镇上去了，直到扫荡过后好几天才回来。报社工作人员群起责问他到敌人据点去干什么，特支并派吴曼华代表报社去找贺扬灵，告发张国祯这一可耻行径，贺扬灵只好同意把张国祯调走。但反过来又责问吴曼华：“你们刊登延安消息，现在长官处（指顾祝同）怪罪下来了怎么办？”吴曼华说：“我们登反汪消息，有什么不对？”贺扬灵说：“我知道，你是被共产党利用，拿了国民党的钱，去给共产党办事。”吴曼华理直气壮地反驳他说：“我们做的都是抗日救国光明正大的事，谁对谁利用呢？”贺扬灵理屈词穷，反过来要她写一张“陈才庸不是共产党员的保证书”。吴曼华一口答应。当场写道：“据我所知，陈才庸是抗日爱国青年。”贺扬灵找不到借口，在恼羞成怒之下，悍然电令国民党崇德县县长钱万镓“兼任《浙西导报》社社长”。

钱万镓要吴曼华办理移交，导报特支事先研究了对策。吴曼华对钱万镓说：“这张报纸，浙西行署没有出过钱，有账可查，机器铅字都是私人弄来的要归还；几年来前吃后空，欠了商人一笔债，也得还清；再说报社人员的留去如何？他们不干了，你如何出报？要移交只有《浙西导报》这四个字。”钱万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就这样造成无限期缓办移交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民党县党部也把《浙西导报》看作眼中钉。一九三九年，曾专门派了一名中统特务到《浙西导报》，收集报社人员的活动材料，伺机进行破坏，一九四〇年，国民党杭区工作站常驻崇德的调查员、中统特务叶某，也曾要人注意吴曼华的活动，说她：“思想左倾，有共产党嫌疑”，但这些人一次次的阴谋都没有得逞。

真正的铜墙铁壁

《浙西导报》同敌伪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广大爱国群众的关心爱护。

早在一九三八年《甯报》创刊时，报社就与活动在桐乡县晏城乡的一支宣传抗日的“青年文化工作队”密切配合。“工作队”经常主动向报社传递日寇扫荡的消息，及时帮助报社转移住地。《甯报》工作人员也利用业余时间，远奔二十多里到屠甸寺演出抗日节目，密切了报社和群众的联系。

《浙西导报》迁至洲泉镇附近的蒋家浜浜西以后，环境仍然非常险恶。这里离开洲泉只有三里，距离石门、新市也不过十里，后两个地方都有日寇盘踞和设有汉奸组织“维持会”。一九四〇年春天，日寇经常下乡“扫荡”，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又把编辑、印刷和发行分成三处。他们依靠群众，组织了递步哨，平时协助报社送信送报，随时探听日寇动向，有情况及时通知报社，遇到敌人“扫荡”，就帮助报社作好掩护，机器、铅字等笨重东西不便搬运，稻草往上面一堆就成了“柴间”。有时还同敌人“捉迷藏”，敌人到东，报社人员到西，报社跟着群众转来转去。敌人指名要带到蒋家浜，当地群众就故意带到蒋家浜浜东。尽管当地男女老少都知道报社的确切地点，但在群众自觉的掩护下，一次也没有暴露过目标。好几次汉奸、特务到村庄附近活动，刺探报社情况，都被群众或报社人员识破抓获，送交附近抗日武装惩办。群众深深钦佩报社工作人员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在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真正亲如一家。报社人员也认识到：报纸是爱国群众的喉舌，也是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坚持出报。因此，即使在敌人流窜“扫荡”时，无法使用印刷机，也改出油印报，让它天天和群众见面。

洲泉地下党组织给了报社有力的支持。当报社经济发生困难时，总尽力设法帮助解决。洲泉地下党书记金文楚，公开身份是北和油车的账房，他白天上班，晚上协助报社义务收听、记录、整理电讯，送交报社排版。有时还帮助报社到日寇据点去采购印刷材料。省政工二队的党组织，通过自己的交通线，经常把从后方寄来的报刊信件，和京、沪、桂、渝等地出版的读物供给《浙西导报》，大大丰富了报纸的内容。当报社被国民党顽固派封闭时，中共洲泉区委和当地群众，协助报社又迅速把印刷机、铅字等隐蔽起来，不让这些器材落到敌人手里。

由于紧密地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浙西导报》连续出版了两年多时间，没有落入敌人的魔爪。相反，当导报人员刚刚全部撤离，原来报社住址被国民党崇德县政府占据，在一九四〇年的十二月二十日那次敌人扫荡中，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连县政府的监印、文书都被抓去。这说明了广大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浙西导报》被封前后

一九四〇年八月以后，浙西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顽固派终于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力量“开刀”了：省政工二队被迫解散，国民党浙西行署悍然下令通缉中共嘉、崇、桐工委书记姚旦。在十月份的一次日伪扫荡中，国民党崇德县县长钱万镓带了全家大小、鸡鸭家禽狼狈逃命，导报编辑高流（何文潮）在《浙西导报》副刊上登了一篇题为《县长太太》的小品文，揭露了钱万镓的贪污行为，并讽刺了他的丑态。钱万镓指使自卫队扣押了高流，并扬言要送浙西行署处理。吴曼华得知后，在钱万镓面前据理力争，钱怕一旦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只好忍气吞声把高流放了出来。此后，

导报处在敌、伪、顽三方的重重压力下，活动更加困难，办报经费无着。经中共《浙西导报》特委请示了隐蔽在上峰村的嘉崇桐工委宣传委员丁国荣之后，并经浙西特委批准，决定派吴曼华再次去天目山贺扬灵处交涉。不料，吴曼华一到天目山，就被贺扬灵扣押起来。国民党崇德县长钱万镒接收导报未成，扣留高流再次失败，早就怀恨在心，趁此一再向浙西行署告密：说“《浙西导报》”是共产党的报纸”，要求处理。与此同时，国民党浙江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于树杰，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以“秘政字第二十三号密电”告知崇德、德清两县县长“《浙西导报》吴曼华等十五人，以导报为活动机关，妄倡异党邪说，挑拨政府与民众间恶感，希即严密查察”。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认定《浙西导报》是中共在浙西游击区的一个据点，必须拔除。就在十一月间，由杨钰松起草电报，诬指《浙西导报》发布金华沦陷消息在正式公布日期之前，命令国民党崇德县政府封闭了报社。这张战斗在浙西敌后整整两年多时间的铅印抗日小报《浙西导报》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浙西导报》虽然告别了广大读者，但它已深深印在千百万爱国人民群众的心里。它所传播的革命火种，已成燎原之势，逐步扩大散布到祖国各地。原来战斗在《浙西导报》的共产党员，如陈才庸烈士等，后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的象吴曼华、史大荣等以后经过党组织安排，撤到了解放区；更多的当年《浙西导报》的读者，在这支战斗火炬的指引下，前仆后继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政协海宁县文史委员会
海宁县党史办公室

上 四 明 山 的 道 路

杨双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不久，在海宁翁埠石塘头，发生了一件震动海北大地的事件。一支打着伪军番号¹的武装，在连长鲍自兴同志的带领下，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横渡钱江，奔赴我党浙东根据地——四明山，归建于新四军浙东纵队，汇入了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

一、爱国的心

鲍自兴原是余杭舟枕乡人，父亲为地方士绅。抗战开展，他激于抗日救亡的义愤，参加了余杭县政工队，不久任县政工指导室主任。在抗日烽烟中，他曾受到我党的影响，目睹许多横遭迫害的共产党人，一个个都是积极抗日的热血青年，他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革命书刊，暗暗地孕育着弃暗投明，抗战到底的意念。

一九四一年，“皖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反共和分裂活动，鲍自兴因同情革命积极抗日而被国民党浙四行署²贺扬灵罢官。后来，因汪浩的保举又回到了天目山，当中校团付一类闲职。但鲍自兴想的是脚踏实地的抗日斗争，他坚决要求上前线。不久，他带了反敌行动队第一大队的人马，来到了曹溪东岸。这时，他推荐靠拢党的朱思洪当了队付。他们在吴山、仓前一带，出没不定，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并由于他们伸张正义而结冤于国民党地方当局。为此，贺扬灵下令要鲍回天目山，企图解除鲍的武装。情

势十分紧张，鲍自兴、朱思洪他们都有一颗爱国的心，可是被国民党顽固派逼得白天难以行动，晚上无处安身，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他们萌发了找党的念头。一九四三年四月，朱思洪终于找到了原吴兴县政工队地下党特支书记周植林同志，周植林当时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因张华夫部队政工室主任呼延夫也在寻找党的组织而留在张华夫部队摸情况。他们见面之后，立即到长兴找太湖地委汇报鲍自兴等同志找党的情况。不久，江南区党委决定派罗希明以我党浙西特派员的身份前来领导。七月七日，鲍以作战被俘的形式，由祥符桥进入杭州。罗希明代表党正式吸收。鲍、朱、呼等人为特列党员，并在杭州明湖浴室建立特支。爱国之心促使这些纯真的热血青年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月间，特支在罗希明的领导下，对张华夫部队两次进行策反，都没有取得成功。鲍、朱、呼被迫只身离开部队，在逃往苏南途中，又遇到国民党浙西行署调查室特务的追踪，不得不分手，刚建立的特支就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二、长安再起

一九四三年，日军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将其在中国的兵力南移，宁、沪、杭地区兵力空虚，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日军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竭力扶植伪政权和伪军。苏南清乡之后，在杭加湖以海宁的长安镇为中心，划定海宁、桐乡、崇德、德清及嘉兴海盐之一部份为汪伪浙江省第二清乡区。调伪教育厅长徐季敦为清乡专员兼保安司令，设署于觉皇寺侧的仰山书院旧址。徐季敦虽身为专员兼保安司令，却事事受制于日军浙江省联络部长安出

张所所长加藤中尉和联络官生田中尉，所属各县及保安大队也都不听命于他，故急需筹建一支保安特务队以保身家性命。

十一月间，呼延夫了解到徐季敦正是他在淮阴六师附小读书时的校长。罗希明同意由呼利用师生关系，打入清乡专署，借敌伪军番号，重新建立一支为我党所控制的武装部队。

当时，徐季敦只给了呼延夫一个伪“专署特务保安队”的番号，人、枪全无。呼通过在伪军中许多把兄弟的关系，在受训编余的伪军中凑了二十来个老弱残兵，十余支长短破枪，草草成行。由呼延夫任队长，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从杭州向海宁长安镇开进。

一九四四年七月，罗希明、许斐文和交通员金国源也从杭州来长安镇，在虹桥附近一村羊毛行楼上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二三月间，罗希明与呼延夫商议，派人到余杭小东门将鲍自兴接来长安。不久，朱思洪在南京也闻讯赶到长安。五月间，汪伪海宁保安大队驻盐官的邓晶平所部一个中队，被海宁自卫大队俞文奎所部夜袭全歼。徐季敦感到惊恐万状，要呼延夫分兵外防。呼延夫知道鲍自兴与国民党海宁县长顾达一、大队长俞文奎等都曾有过交往，约鲍同行。他们发现盐官镇和石塘头的伪军皆已撤离，争取在这两个海口据守，可以取得税收，解决部队供给，于是罗希明同鲍自兴、朱思洪同时派入呼部，并建立党的特支，由呼任书记，朱任宣传委员，鲍自兴的公开身份为队副，朱思洪为教官。就这样，一支由我党控制的“地下军”终于在几名年青的共产党人的奋斗之中，在长安东山再起。

三、发展壮大

鉴于前两次策反失败的教训，太湖地委指示长安部队特支，“不要妄动，应作稳步发展”，特支根据党的指示，利用敌伪军番号，争取武器装备，扩充兵员和不断扩大活动范围。

四四年五月，鲍自兴即带一个班，分兵石塘头，控制了第一个出海口。当时的石塘头和盐官镇一样是钱江两岸的羊毛、黄酒等货物和商旅过往要道，通过征用，部队取得了给养，迅速扩大。

七月，日寇清乡失败，徐季教丢了官，特支乘人事变动之机，由呼延夫出面去杭州日伪上层活动，部队摆脱了伪专署的隶属关系，扩编为保安第十大队，由呼延夫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由鲍自兴任一中队队长，驻盐官、沈士和科同桥，留朱思洪任二中队队长，驻许村、翁埠和许巷。同时抽集一个排和一个短枪班，组成三中队与大队部同驻长安。

一九四五年春，张恒充任伪和平军军长，命长安部队改编为特务营。特支利用日寇对伪军“分而治之”的阴谋，一方面接受改编，补充武器弹药，另一方面坚持原防原编，始终把部队控制在我党领导之下。

经过一年努力，部队发展到四百人，一营三连建制，有步枪一百六十余支，短枪、冲锋枪三十余支，马克沁重机枪一挺，控制了长安、许村两个车站，盐官、翁埠、石塘头三个渡口，形成了一个以长安为中心，沟通浙东、浙西方圆约一百平方公里的控制区。

四、支援浙东

一九四四年夏，浙东纵队五支队一部，由曾平、张季伦等带领，

到海北，准备利用角里、黄湾一带多山地形和这里党和群众基础，开辟一个新的游击区，需要长安部队的配合。太滬地委也考虑到今后长安部队可以渡江去浙东，为此，江南区党委决定把长安部队的领导关系划归浙东区党委。七月，罗希明根据区党委的决定，把长安部队的工作关系交给了海北地下党负责人刘明。为了配合地方工作，刘明将祝歧根同志由海盐派往许村，打入了伪许村镇公所。

据刘明的要求，鲍自兴随刘明去海盐角里堰与海北分队曾平、张季伦等同志见了面。曾、张要求长安部队在弹药上给予接济，并经常提供敌伪军活动情报，互相配合。鲍回长安后，特支决定把新领到的750发全新子弹交海防大队带给海北分队。半月以后，海防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洪志来石塘头时，鲍又将两架步兵用的蔡司望远镜送去。此后，我党浙东根据地的食盐，经由石塘头大量向海北、³南运销。浙东银行发行纸币用的道林纸，部队用的球鞋，也都是从这条海上捷径运去的。

长安部队与浙东根据地的往来，很快引起敌伪顽各种反动势力的注意。一九四四年秋，驻杭日军特务机关派出了一个以陈国祥为首的情报组到石塘头，扬言将盐税归其统收，企图以石塘头为立足点向浙东作情报派遣活动。经特支研究，由呼延夫派一小股武装，伴攻石塘头，作断续交火，使这几个汉奸第二天天一亮就往长安逃窜。鲍自兴所部驻盐官不久，日伪特务机关又派出以陆屏为首的情报组到盐官。陆屏是南浔人，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当过驻硖石日军守备队的密探，带领过日本人扫荡，使俞文奎大队队副扬建腹部中弹几乎丧命。四二年陆被余杭县政府关押时，鲍自兴受人之托，曾将其保释，所以他来盐官后，便将来意告诉鲍自兴。同时，俞文奎也派人与鲍接头，要

将陆屏等人引渡。鲍自兴顺水推舟，默许他们乘黑夜将这几个人抓走，陆屏等人吓得魂不附体，要求鲍派人护送回杭。这几个人在回石井途中都由俞文奎预伏的人逐个枪杀了事。

一九四五年春，日军末日将临，自顾不保。特支根据刘明同志的指示，抓紧了内部建设，先后发展了施恒初、王德明等人入党。这些人分别担任了指导员、文书等职务。刘明还从海盐调党员龚志凌到三中队任班长。特支在仰山书院旧址办了两期上等兵集训班，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由于部队迅速扩大，不免鱼龙混杂，虽在教习后未能完全达到改造旧军队的目的，但对许多人选择应走的道路仍是有其促进意义的。

五、石塘义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海宁县自卫大队的一个中队进入长安。镇上其余伪军伪组织纷纷倒向国民党，戴谷音赶来。当面要呼。鲍等人接受改编。长安部队四面受敌。刘明传达浙东区党委“坚持原地待命，加强对部队控制，作好行动准备”的指示，特支为了争取时间，对外宣称“十二军已与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系”，将番号改“先遣独立支队”，又把朱思洪所带二中队撤回长安，作了突变准备。

不久，方晓同志奉浙东区党委城工部之命来长安传达区党委要长安部队立即去浙东归建制的命令。方晓同志找到祝岐耕后，见呼延夫传达了命令，约定在第三天夜间涨潮时，派部队在江面上接应。方临别留下一信，以“海风多厉，诸祈珍重”八字相嘱。

为执行区党委命令，特支在刘明同志支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第三天晚饭后以“营部紧急调防”为名，命令把部队带到石塘头集中，并立即把部队中政治面目不清或反对去新四军的排以上人员支差外出。特支并作了分工。

准备工作的第一、二两天一切顺利，第三天，鲍自兴带一个排先步行至石塘头，占领海口，征好船只，然后带上一个班回到长安。中午三中队队长刘白朗抢了一个汉奸老婆的金银准备逃脱，而被抓回。特支开紧急会议，讨论刘白朗问题，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但要等部队拉到江边以后，再释放刘白朗。鲍自兴即回许村去了。不料晚饭后，约七时左右，部队在刘白朗等人的挑动下发生了哗变，他们扣押了钱志明，并冲到大队部，要挟呼延夫表态。呼延夫与朱思洪去二中队训话，事态未能平息。朱思洪即去找刘明，说部队带不动了，而大队部被短枪班的人把守，刘明无法与呼延夫联系。眼看接应的时机将要错过，刘明决定，二连的党员和龚志凌等立即去石塘头与一连会合。当他们赶到石塘头时，鲍自兴和一连的士兵早已望眼欲穿、焦虑万分。经讲明情况后，鲍自兴立即往高处一站，大声宣布“今天我们要上四明山去，愿走的同走，不愿走的可发给路费”。对少数不去浙东的士兵遣散后，鲍自兴下令登船启程。

船到盐官南面的江面时，天将拂晓，晨曦中，隐约见到一条海船正在开来。船头上有人拿火把在转圈。鲍自兴命人把准备的报纸卷成火把，点燃起来。两船靠拢时，只见方晓同志站在船头，正是海防大队的同志前来接应。在石塘头刚举起义旗的人们，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他们快活得跳了起来。

海船在临山北的海滩杜丁秋站靠岸时，红日已经高高升起。在

刘明同志的带领下，鲍自兴和他的八十七名战友们，踏上了通向浙东根据地中心四明山陆家埠的前进之路。

(根据海宁县党史办提供的资料
编写)